一样种田三样心绪

　我因为种过田，遇到有关种田的文字也就留心。白居易、陆游、陶渊明都是我喜爱的诗人，又恰是千秋诗史中寥寥可数的几个亲自下过田的诗人，都留下了种田的诗，陆续读来，就有些话可说。

　　白居易大约在40岁后，丁忧守制——因母亲去世停职三年——于渭村，这期间在田间劳动过，有诗为证：

　　谷苗深处一农夫，

　　面黑头斑手把锄。

　　何意使人犹识我，

　　就田来送相公书。

　　诗题叫《得袁相书》：农活把我变得已和真的农夫没什么两样了，怎么送信的使者还能认得我，把相公的信一直送到田头呢？

　　如果仅读一二两句，一时还不知这是自豪还是自怜，读到了三四两句，其自得之意，就溢于言表了。自有陶潜以后，士大夫退守田园，已算得一种高度，所以，身在田间，可自豪一也；而又有权相来书，可自豪二也。这是一首表达了双重自豪的诗。

　　陆游晚年，带着一腔未能施展的报国壮心，归居田园，慢慢调整心态，进入新的角色，写了不少自得其乐的田园诗。《蔬圃绝句》云：

　　百钱新买绿蓑衣，

　　不羡黄金带十围。

　　枯柳坡头风雨急，

凭谁画我荷锄归？

　　陆游明白宣示：我不羡慕达官贵人的荣利，而以风雨归蓑为值得自豪的美的形象。陆游是个有镜头感的诗人，他若生在今天，一定是个摄影迷。这次他希望谁来给他画个披蓑荷锄的肖像，正如他在《梅花绝句》中言：“何方可化身千亿，一树梅花一放翁？”希望能在梅花树下留影，多多益善，成千万亿。

　　其实两位诗人在心里都有一个形象清晰而地位崇高的前人，就是陶渊明。在陶诗的接受史上，白、陆都是重要人物，白居易还是将陶诗推崇到独特地位的第一人，他写过《效陶潜体诗十六首》，开了拟陶、和陶的先河。他的《访陶公旧宅》诗云：“……每读五柳传，目想心拳拳，今来访故宅，森若君在前，不慕樽有酒，不慕琴无絃，慕君遗荣利，老死此丘园……”，一片虔诚可感。

　　陆游本来是一心准备为朝廷收复国土而“慷慨欲忘身”的。可是他深爱的朝廷并不珍惜他的忠诚，他也就只好在田园中寻找乐趣，像钱钟书说的，“咀嚼日常生活深永的滋味”了。他在这情境下发现陶诗，热爱陶诗，也是自然的事。“我诗慕渊明，恨不造其微，千载无斯人，吾将谁与归？”“君看夏木扶疏句（陶句），还许诗家更道不？”一个一心去做战士的人，不得已做了隐士；一个本来崇拜诸葛亮的人，就这样崇拜上了陶渊明。

　　但榜样的力量终究有限。圣贤庸儒，从来泾渭分明。即使贤如白、陆，希慕渊明，五体投地，也终远隔层云，不能相近。

　　看看陶诗吧：

　　种豆南山下，

　　草盛豆苗稀。

　　晨兴理荒秽，

　　带月荷锄归。

　　道狭草木长，

　　夕露沾我衣，

　　衣沾不足惜，

但使愿无违。

　　种田并不见得高尚，并不值得自豪，种田是辛苦的，何况自己又不擅此术。但比起在官场倾轧煎熬，种田的心情要相对平静。对于陶渊明，这既是寻找安身立命的归宿，却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，“但使愿无违”而已，并无什么高风亮节可显示。所以陶诗的平淡不是追求平淡，而是自然平淡，不得不平淡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白居易好像是下基层镀金，镀了金还是要上去的；陆游则如当年知青初到广阔天地，感觉新鲜而浪漫。白居易因陶的存在而企羡一种抽象的超越境界，却又希幸权力的垂顾，在他心目中，陶的田园是一座高峰，达官贵人也是一座高峰，他在谷苗深处，就真的低了；陆游有点像明星出场，少不了入影入新闻，所以虽有自豪感，却像熊十力批评的宋儒那样：“心存圣贤便不是”，心存亮相也不是。

　　陶渊明虽是主动远离官场，并在种田中找到真实、洁净、当然也辛苦的生存方式。但他初非要做高人，只是真实，便自然高贵。

　　梁清远《雕丘杂录》云：陆放翁的诗，把山居景况一一写尽，但“时有浮夸自侈之谈”。如果去掉这一点，“便与陶渊明何殊？”可谓知言。

　　但也许，话要反过来说：渊明先生之所以不能到者，正是一般人都有的那点“浮夸自侈”气难去也。